

A Leo Strauss Reader

施特劳斯读本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

刘小枫 选编



华夏出版社

A
Leo Strauss
Reader

施特劳斯读本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

刘小枫 选编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施特劳斯读本/刘小枫选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 1

ISBN 978-7-5080-9323-9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施特劳斯(Strauss, Leo 1899-1973)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712. 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9023 号

西方民主与文明危机：施特劳斯读本

编 者 刘小枫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编者说明

一

西方学界有人说,施特劳斯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最伟大的教师——这话听起来似乎夸张,若埋头思忖一番,就会觉得其实未必。

如今做苏格拉底的学生比在柏拉图的时代难得多,因为,两千多年来,人类经历了太多事变,产生出了太多思想大家,苏格拉底的德性早已不再是西方智识人的精神楷模。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施特劳斯仍然努力做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学生,从他们记叙的苏格拉底的行事和言辞中学习智慧。成为施特劳斯的学生,最终意味着成为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学生,这与成为比如说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洛克、康德、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等任何一位的学生都截然不同,甚至也与成为所有这些人的学生截然不同。

二

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斯宾格勒猛然惊呼“西方的没落”,让 20

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欧洲思想家无不感到芒刺在背。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的没落”并非指政治—经济实力衰退或昌盛景象不再,而是西方文明的灵魂沦落:有德性的智识丧失了声誉,人们不是用智识去区分明智与愚蠢、正确与错误、美好与丑恶、高贵与低贱,反倒纷呈才智,以混淆甚至抹杀德性差异为尚。从前的西方智识人追求思想的卓越、高贵和美好,如今的西方智识人则追求奇异观念、破碎经验或思想的民主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西方智识人以为,文明大国的崛起仅仅以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为标志,殊不知这仅仅证明了西方现代文明精神的没落。

三

伟大的思想者无不是灵魂引领者,如今的大学教授,没谁不是西方某个或某些现代思想家的被引领者。认谁为伟大的思想家,意味着愿意让谁来引领自己的灵魂。按苏格拉底的爱欲经验,在我们的灵魂被引领之前,我们需要认识引领者的灵魂高贵还是低劣。苏格拉底的思想经验的根本在于,认识自己的灵魂比什么都重要。但要实现这种认识,需要对理解的理解、对思考的思考、对品质的品味,这意味着需要辨识人的灵魂的德性差异。

施特劳斯是这样的教师:他引领我们从苏格拉底开启的心智德性获得智慧,学会辨识思想史上各色灵魂的德性,从而懂得如何以高贵的精神养育我们自己的理智德性,进而“彻底脱离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名利场上的吵吵嚷嚷、行色匆匆、缺乏思考、肤浅低级”,寻回对美好事物的感觉和经验。

四

施特劳斯生前发表的论著,无不是他付出罕见的道德—智识努力的见证。研读他的论著,需要读者自己同样付出极为艰辛的道德—智识努力,至少需要首先熟悉西方历代经典。即便对于西方学界的不少读者来说,阅读施特劳斯的论著也有相当难度。

施特劳斯在任教生涯中经常应邀作公共讲座,论题和表述方式都切合公共学术性质,具有较为广泛的学术普适性。笔者尝试以这类讲演文为基础编选了《施特劳斯读本》,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本科生的通识读物,经一学期试用,收效良好。在诸多同学和教师的鼓励下,笔者对原有篇目稍作调整,收入少量非讲演文,遂成现在的模样。

五

读本按一学期十六课时(每次两学时)设计,选文十六篇,均出自笔者主编的“施特劳斯集”(《什么是自由教育》和《自由教育与责任》两文,选自即将出版的《古今自由主义》重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考虑到读本服务于本科教学,笔者删掉了原有的编辑性技术说明。

刘小枫

2017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目 录

编者说明

第一编 现代性危机

我们时代的危机	3
政治哲学的危机	21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38
我们能够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	55

第二编 现代学术的危机

政治哲学与历史	77
海德格尔式存在主义导言	98
社会科学与人文素养	123
“相对主义”	135

第三编 古典学问与现代

苏格拉底问题	155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	175
论古典政治哲学	190
迫害与写作艺术	209

第四编 现代教育的危机

马基雅维利	229
进步还是回归?	258
什么是自由教育?	313
自由教育与责任	323

第一编 现代性危机

我们时代的危机

李永晶 译

[中译编者按]本文及后文《政治哲学的危机》为施特劳斯在1962年做的两次学术讲演,原刊于Harold J. Spaeth编,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Politics*, Uni. Of Detroit Press 1964, 页41-54, 91-103。

诸位对我的美言善意让我感动之情油然而生,不过,我还想简单地补充一句。我没有朋友们说的那么温和,我的论敌们肯定对此毫不否认。言归正传,我今晚和明天要做两次讲演,其实只是一个,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与政治哲学的危机。本来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划定这两次讲演的范围,而我的划法也许不是最好。因此,如果讲座显得不够连贯,还请诸位海涵;况且我原本也没有打算面面俱到。准确地说,我要讲的主题是“我们时代的危机,作为政治哲学危机的后果之一”。

我们时代的危机,也就是我将阐述的要点,其要害在于对我们可称之为“现代方案”(the Modern Project)的怀疑。现代方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它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社会。然而,时至今日,现代方案的不足已经众所周知,并引起了普遍关注,这迫使我们积极考虑如下想法:即,必须用另一种精神使这种新型社会亦即我们的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精神不同于那种起初曾赋予这种社会以生命的精神。现代方案起源于现代政治哲学,源于

16、17 世纪出现的那种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哲学概念自身的解体。对今天大多数政治学家来说,政治哲学不过是意识形态或神话而已。

我们必须考虑复兴政治哲学。我们必须回到政治哲学最初遭到破坏的地方,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诸起点,回到现代哲学还不得不与古典政治哲学一争高下之时。古典政治哲学源自苏格拉底,并主要经亚里士多德详加阐发。古今之争就发生在那个时候;而人们现在一般只把那场争论视为法英等国发生的一场单纯的文学争论;在英国,此次争论的最著名文献是斯威夫特(Swift)的《书籍之战》一书。事实上,那不仅仅是一场文学争论;它根本上是现代哲学或科学与古代哲学或科学之间的一场争论。只是由于牛顿的工作,那场争论才告完成;争论似乎以偏向现代人的方式完全解决了问题。而我们的使命就是重新唤醒那场争论,因为现代答案已经施行了三个多世纪,业已显示出其与古代答案相比之下的诸多优点,也显示了最恶劣之处。为了具有说服力,我必须尽可能贴近今天西方普遍接受的东西。我不能从今天只有极少数人同意的前提出发。换句话说,我不得不在某种相当程度上 *ad hominem*[以出自个人偏好的方式]进行论证。但愿这不会招致误解。

为避免另一种误解,我想先给出今晚讲座的概要。西方的危机过去一直被称为西方的没落,某种意义上说的是人的最后没落。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过我们也不可否认,西方的某种或某些形式的没落已然发生。西方在力量上的没落最为显著,其生存本身如今正面临威胁。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没落并没有构成西方的危机。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事实上已经不能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的目标曾经是普遍社会(*the universal society*):一种由诸平等民族构成的社会,各民族又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所有这些民族都可以

借助科学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有助于增强人的力量,并改善人的境况(relief of man's estate)。科学会带来普遍的富裕。在那种状态下,没有谁会再觊觎其他人或其他民族。普遍的富裕会带来普遍的且完全正义的社会,就像一个完全幸福的社会。

如今,许多西方人已经开始怀疑这套方案,因为共产主义的自我启示具有强大的力量,并从根本上对抗西方关于如何建立和治理这种普遍而正义的社会的想法。西方和共产主义之间敌对的后果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绝无可能在可见的未来存在。政治社会过去一直是并在可见的未来也仍将是特殊的社会、有边界的社会,是一个关注自身改善的封闭社会。不过,我们既然已经具有了上述经验,就不仅必须重新确定政治的方向,还必须重新确定我们思想上的某些原则。

我这里要提三点。第一,这种特殊主义,或换一种说法,这种爱国主义本身果真不比普遍主义或全球主义更好?第二,是否有理由期待正义与幸福会是富裕的必然结果之一?富裕真的是美德和幸福的尽管不充分但必要的条件之一?自愿贫穷的观念是否包含某些真理?对于美德和幸福而言,不自愿的贫穷是否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第三,相信科学在本质上服务于人类力量,这种信念难道不是一个错觉甚至丢人的错觉?好,让我正式开始。

我们已深陷于某种危机之中,这点几乎不证自明。一天天的报纸报道着一个个危机,这些日常的小危机无疑可以看作一场大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的诸多部分或要素。我认为,这个危机的核心在于这样的事实,某种起初尚是一种政治哲学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宾格勒曾将那种危机诊断为西方的下降或没落。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只是少数高级文化

中的一种。但对他自身而言,西方文化又绝不仅仅是若干高级文化中的一种。对他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全面综合的文化,是唯一征服了全球的文化。最重要的是,西方文化是唯一向所有文化开放的文化,它既不把其他文化视为某些野蛮形式而予以排斥,也不把它们视为未开化的文化而以俯就的方式宽容它们。西方文化是唯一获得文化本身的充分意识的文化。文化原本意味着人的心智的教化,而文化的现代派生概念却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相互平等的高级文化。然而,正因为西方文化是达到了充分自我意识的文化,它成了最后的文化;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西方的没落意味着高级文化的可能性本身已损耗殆尽。人的最高可能性业已枯竭。然而,只要人的高贵使命尚存,只要人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难题尚未在它们能被解决的程度上获得解决,人的最高可能性就不可能耗尽。因此,我们可以说——诉诸我们时代的科学这个权威——斯宾格勒的分析和预言并不正确。我们最高的权威即自然科学认为,它能带来无限的进步。那些基本难题要是已经获得了解决,自然科学的上述宣称似乎就没什么意义了。倘若科学能带来无限的进步,就不可能有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终结或完成。只能有人类前进步伐的残酷中止:或因自然力量本身的作用,或因人类大脑和双手的主导。

无论如何,在某种意义上,斯宾格勒已证明自己是对的。西方的某些没落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1913年,西方——实际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本可以为全球立法而不用费一枪一弹。因为,西方至少曾在半个世纪里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整个地球。而今天,别说统治世界了,西方本身的生存也已遭到来自东方的威胁,起初可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以来,似乎可以说,共产主义的胜利将是西方的彻底胜利,是英国工业、法国革命、德国哲学三者之综合的胜利,这种综合超越了诸民族界限,

或者还包括东方。无论西方的力量多么衰落,无论西方面临的危险多么巨大,这种衰落,这种危险——不,应该说西方的失败与摧毁——都不足以证明西方处于危机之中。西方可以带着确定无疑的目标而光荣地下降。

西方的危机在于西方渐渐不再确信自己的目标。西方过去一直确信自己的目标,确信可以实现所有人的团结。因此,西方十分清楚地看见自己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如今,我们不再有那种确信和清晰。我们有些人甚至对未来感到绝望。这种绝望说明了当今西方的许多堕落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除非致力于某个普遍的目标,献身于所有人的团结,否则就绝不能健康地存在。一个社会也可以是个健康的部落。然而,一个一度习惯于用某个普遍目标来理解自身的社会一旦不再相信那个目标,肯定会变得彻底不知所措。我们发现,那种普遍的目的直至前不久还得到过明确的阐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那些著名的政府宣言就是例证。这些宣言只不过重复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最成功的形式最初提出的目标:那种政治哲学中的一种期望以古典政治哲学奠立的基础为基础,但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建立的[大厦]结构——一个在真理和正义上俱比古典政治哲学期望的社会更出类拔萃的社会。

根据那项现代方案,哲学或科学的本质不再被认为是沉思,而是行动。用培根那句美妙的名言来说,哲学或科学应该有助于改善人的境况(relief of man's estate)。应该为了增强人的力量而培育哲学或科学。科学或哲学应该使人能够借助理智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哲学与科学原本一家,应该尽可能地促进进步,不断地创造出更大的繁荣。这样,每个人都将享受到社会或生命的所有利益,从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全部意义,即实现每

个人安逸的自我保存(按洛克的说法)的自然权利以及那种权利所带来的一切,同时实现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一切能力的自然权利,这种发展会与任何其他入同样的发展达成和谐一致。因此,这种不断朝向更大繁荣的进步也会变成或可能引起朝向更大自由和正义的进步。这种进步必然会朝向这样一种社会:这个社会平等地包容所有人,成为诸自由平等民族的大联合,其中每个民族都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因为人们已经相信,在单个国家或少数国家中不可能有长期持久的繁荣、自由和正义。为了使世界不再威胁西方民主制,人们必须让全球民主化,让每个国家内部民主化,也让各民族组成的社会民主化。人们认为,单个国家内部的良好秩序以所有国家内部或之间的美好秩序为前提。人们认为,朝向普遍社会或普遍国家的运动不仅由其目标的普遍有效性或合乎理性保证,而且因为朝向这个目标的运动本身似乎就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极少数人,只有那些奴役着千百万同胞的人,只有那些竭力维护自己腐朽利益的人,才抵制这场运动。

以上对一般而言的人类境况以及对特殊而言的我们这个世纪的认识仍然具有某种合理性,不是尽管而是正因为有了法西斯,直到苏联最终爆发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最卑劣能量之后,事情才不复如此;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只是一面没有军队甚至没有将军的旗帜,终于被它自身的原则谴责并驳倒。一段时期以来,许多可教的西方人——遑论那些不可教的人——似乎都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只是与西方运动并行的一种运动:它就好比双胞胎中那个有点不耐烦、粗野和顽劣的家伙,它必然会变得成熟、有耐心和温和起来。然而,事情并非如此。除了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之外,苏联共产主义对那些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往往报以轻蔑,或至多表现出几

丝假情假义；而在生死攸关的危险时刻，苏联共产主义渴望得到西方的帮助却又决心绝口不谈一个“谢”字。西方运动已经不可能把苏联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个新的外敌——自己数世纪以来曾与之斗争的那种外敌。西方方案曾以自己的方式准备反对所有古老的罪恶形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方案不能提供任何言辞与行动措施以反对新的罪恶形式。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似乎还有充分的理由说，西方运动和苏联共产主义具有共同的目标，即追求一种由自由平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普遍繁荣社会；二者只是在手段上有分歧。对苏联共产主义来说，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最神圣的目的，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一切有助于达到最神圣目的的东西都分享了目的的神圣性，从而也变得神圣起来。一切有碍于实现那种目的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某个人曾把谋杀卢蒙巴（Lumumba）总理描写成一场应该受到谴责的谋杀，并以此暗示，还有不可谴责的谋杀，比如谋杀纳吉（Nagy）。

这么看来，西方运动与苏联共产主义之间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更有类型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显然涉及道德，涉及手段的选择。换句话说，人们日渐明白，无论流血的社会变革，还是不流血的社会变革，都绝不可能消除人性中的恶。只要有人，就会有恶意，有嫉妒，有仇恨；因此，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必使用强制性限制的社会。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再否认，今天苏联共产主义只要在实际而非名义上继续存在，就仍将在以后继续存在：一个僭主出于对宫廷革命的恐惧而减轻或加剧自己的钢铁统治。不过，僭主也害怕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西方唯一可以多少获得一些信心的遏制手段。

苏联的共产主义经验给西方运动提供了一个双重教训：这是个政治上的教训，它一方面关乎在可见的未来期待什么和做什么，另一方面关乎政治的原则。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政